

(接上期)

## 以人为本、以学生为本、以人才为本的精神

大学是以为人本的事业。在大学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、以学生为本、以人才为本的理念,把关心人、尊重人、理解人、发展人、帮助人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。

不管大学的功能如何拓展,如何多元化,但培养人才永远是大学的永恒主题、中心任务、第一职能,离开这个主题,大学就不叫大学。大学的干部、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,都应当对学生充满爱心,满腔热忱地为学生服务,对学生的全面发展、成才成功负责,对学生的前途命运负责。人才培养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生产,物质产品不合格,可以报废,可以再造。而人才是不能报废的,必须全程负责,确保一次成功。

求贤若渴,爱才如命,应当是教育家的职业天性。一个好教师,应当既会教书,又会育人;既是知识的启蒙者,又是人生的领路人。即使学问再高,如果不善于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、提携人才、保护人才,那也算不上一个好教师。一个优秀的教育家,应当识才有眼、育才有方、用人有胆、护才有勇。对一个教育家而言,如果自己发现了一些被埋没的人才,起用了一些奋发有为、潜力巨大的青年才俊,保护了一些暂时存有争议、为世俗偏见所困扰的创新人才,那是人生最大的价值、最大的安慰。社会上有句话,叫“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”,大学的领导者,应当有一种“为人才不惜两肋插刀”的精神。

教育家的远见卓识,不能只是对既成的人才给予尊重和重用,更重要的是对于暂时还没有成名的潜在人才给予大胆提携,敢于对人才进行“风险投资”。不只“买现货”,更重要的是“买期货”;不只买“绩优股”,更重要的是买“潜力股”。这也是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、普通大学与知名大学实行人才错位竞争的一种策略。

大学的竞争,核心是人才竞争。一所大学,如果能聘请到一流的教师,能招收一流的学生,那就是一流的大学;如果能聚拢到世界一流的人才,那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;如果只能吸收到二流的人才,那就是二流的大学了。

在大学精神中,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是个核心问题。

对于什么是杰出人才,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。简而言之,杰出人才就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,能把自己独特的东西奉献给世界的人。越是专才,越是偏才;越是天才,越是怪才;越是经天纬地的雄才,越是凡眼不识、世俗难容之才。

生物学告诉我们,个性化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基本因素,自然选择中形成的某种个性是基因变异决定的。由遗传变异而形成的个性加速了生物的进化。统计资料表明,世界上每一万人中会有一个古怪的人,每一万五千人中会有一个彻头彻尾的“怪人”。历史上很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发明家往往是“怪人”,他们怪异的性格可能成为他们脱颖而出的砝码。像牛顿、伽里略、富兰克林、开普勒、达尔文等科学巨匠,都是特立独行的“怪人”。我们的大学教育,应当在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尊重个性,照顾特点,发展天赋;应当在基本合格的前提下,培育特长,提携优秀,鼓励拔尖。

在清华、北大的历史上,有过很多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佳话。在当时的高考中,吴宓数学得0分,钱钟书数学得15分,仍被破格录取,他们后来都成了学术大师;华罗庚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,却被破格聘到清华做了教师,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数学家;梁漱溟只有中学文凭,没有考进北大,却被蔡元培聘入北大当了教授;陈寅恪在国外求学14年,辗转于日本、德国、瑞士、法国、美国的多所大学,涉猎百科,掌握了20多种外语,然而却没有拿到任何文凭、学位,后来被中外多所大学聘用,成为现代中国一位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、博学卓识的宗师。学校育人不但要讲究合格,而且要敢于破格。我们的大学不能因为讲规范而走向僵化,讲全面而助长平庸,讲合格而抹煞天才。我们讲的全面



# 大学精神

发展,应当是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,而不是各科学业都全面优秀。要求一个学生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语文、外语、历史、音乐、体育、艺术,这怎么可能呢?

在当今社会,工业化、标准化、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也会反映到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中来,这就是忽视特点,磨灭个性,按照统一的格式选人。它的优点是可以保证合格率,而它的弊端就是把某些特殊人才、杰出人才当作不合格产品淘汰了。一所卓越的大学,不仅在于它能够造就大批合格人才,最可贵、最难得的是它善于把个别超凡脱俗的天才人物筛选出来,让他们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,开创出一片新奇的天地。

## 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、多元共生的精神

和而不同,多元统一,这是宇宙永恒的法则,是和谐的最高境界。

学术自由,兼容并包,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,是大学繁荣的第一要义。

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,其思想光芒照亮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发展道路。在当时比较落后的社会条件下,为什么能够出现道家、儒家、佛家、墨家、法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农家、杂家、小说家等众多的学术流派?为什么能够涌现出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、孙子、管子等流芳千古的杰出人才?为什么能够产生出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孙子兵法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等影响久远的鸿篇巨著?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变动,诸侯纷争,私学兴起,创造出了一个政治宽松、思想自由、人才竞争、人才流动的社会环境,形成了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

世界上最有活力、最有创造力的大学,无不把“思想自由,个性解放,兼容并包,多元共生”作为不可动摇的办学原则。如果说,在政府运作中,把寻求最大的共识合力作为理想目标,认识越统一、步调越一致就越好,那么,在学术运行中,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局面:思想多元,流派纷呈,公平竞争,自由讨论,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。正是在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的争鸣、碰撞和竞争中,催生了新思想的火花。大学中最可贵的精神就是自由探索、大胆创新的精神。任何真理都是在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比较中形成的,任何创新思想

一开始都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。在科学试验中失败一千次也没关系,只要一次成功就足够了。良好的学术环境不在于口头上高唱学术自由,而在于对探索创新过程中出现失误失败的容忍。如果在大学中,听到的都是众口一词的声音、千篇一律的表态,看到的是默默无闻的景象,那就窒息了创新的活力,失去了大学的价值。蔡元培认为,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生有三项基本原则,一是大学应当独立自主,二是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,三是具有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。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《大学的理念》一书中指出:“大学乃是知识和科学、事实和原理、探索与发现、实验和思考的高级保护力量,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,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。”

越是在这种多元交汇的思想文化环境中,我们越要有自己的主心骨,越要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,越要树立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学会鉴别,学会筛选,学会吸收,学会抵御,学会竞争,大力提高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实力、活力、影响力和竞争力,防止在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中把自己的灵魂荡丢了,把自己的主导地位荡掉了。

## 服务社会、超越现实、面向未来的精神

如何处理大学与社会、适应与超越,现实与未来的关系,是大学精神中争论不休又纠缠不清的问题。

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,是社会肌体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,离开社会大学就无法存活。大学的位置不是在社会之外,也不是在社会之上,而是在社会之中。如果大学对社会冷漠无情,格格不入,不适应,不结合,不服务,不奉献,反过来,又怎么可能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呢?当今大学的发展趋势,不是与社会越来越疏远,而是越来越贴近;大学与社会的结合,不是越来越松弛,而是越来越密切了。可以说,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,大学与社会已经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难解难分了。如果今天再提出大学“回到洪堡”、“回到蔡元培”,那绝不是大学的前进,而是大学的倒退了。

大学提供的社会服务,不是零敲碎打、急功近利的服务,最根本的是提供长远战略的服务,我们不能要求大学像社区服务站那样,为大众提供随叫随到的即时服务。大学不能一味地去适应现实,为现存的一切提供合理的注释,去论证“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”这一命题。大学最可宝贵的品格是超越现实,面向未来,为建设未来的理想社会去准备理想的人才,设法去实现“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”这一命题。

大学生是整个社会中最富理想、最富幻想、最富梦想的一个群体。这些20来岁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初出茅庐,涉世未深,最可贵的就是那股锐气,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。年轻人如果没点理想,没点幻想,没点野心,没点狂气,将来成不了大器,顶不了大用。大学应当是允许青年做梦的地方,激励他们梦想成真。如果大学失去理想主义的色彩,年轻人偏于保守,老于世故,唯唯诺诺,死气沉沉,整天为一点日常琐事、蝇头小利而奔忙,那国家和民族就失去了希望。

国内外也有些学者认为,大学必须拥有绝对的无条件的独立和自由,真正的学者应当远离任何特定的社会身份和利益,永远为思想而活着。纯粹的学术只是追求真理,不迷恋任何功利性的成就,不追求任何实用的目的。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“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”,永远是社会的良心,文化的卫道士,一群永远的批评者、异议者、孤独者。这种大学理念,过去一千年没有实现,今后一千年更不可能实现,只能是一种大学乌托邦。

当今中国,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,为大学的振兴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。科教兴国,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为大学建功立业提供了极其广阔的舞台。我们的大学应当顺应时代潮流,抓住历史机遇,唱响教科经相结合、产学研相结合的主旋律,在结合中寻找机会,在服务中体现价值,在贡献中争取支持。

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,是人类最基本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。一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,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交织、共存共荣的历史。没有物质生产,人类就不能生存,没有文化生产,人类就会永远处在愚昧之中。

文化承载着历史,传承着文明。文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。一个民族的振兴是以文化的复兴为先导的,而一个民族的衰亡也是以文化的泯灭为先兆的。如果说历史文化成果记载着一个国家曾经创造的辉煌,那么现实文化状况则反映着一个国家当今的文明进步水平。文化所具有的跨越时空、万古不朽的特征,使得人类社会得以继往开来,温故而知新。

文化的特殊作用,就在于它的教化力、融合力、渗透力、影响力,既可以化人,也能够化物。文化无时不在、无处不有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,随时随地都在支配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、行为选择和人生态度。

文化的力量首先是精神力量,精神的力量虽然看不见,摸不着,但却可以转化为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。比如一个社会科学真理的传播,可以引发一场社会革命,使国家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;一项科学技术的产生,可以引发一场工业革命,使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深刻的转变。

文化产生的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。尽管文化也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,比如一件珍宝,可能价值连城;一卷字画,可能拍出天价;一部影视作品,可以创造巨大的票房价值。然而,文化所产生的效益主要还是社会效益。一部经典名著,一曲不朽乐章,一座辉煌的建筑,可以千古流芳,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启迪、道德感化,以及美的享受,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。

文化创造的价值,往往不是通过自身来体现的,而是通过文化渗透其中的人和事物的增值效益来体现的。显而易见的是,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和一个人缺乏文化教养的人,他们的社会地位、工作成就和收入会产生巨大的反差。同样,一个高文化含量的商品和一个低文化含量的商品,它们的市场价值也是大不相同的。

文化尊严和文化价值的实现程度,同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水平是成正比的。

在一个经济贫困、温饱不济的社会里,人们没有余力从事文化活动,自然也很难领略文化的价值。

在一个专制独裁、缺乏民主自由的体制下,文化的尊严必然受到蔑视,文化的命运必然多灾多难。

在一个急功近利、物欲至上的环境中,文化的价值必然会受到扭曲,文化的生存空间必然会受到挤压。

只有在经济繁荣、政治开明、社会和谐、个性自由的条件下,才能绽放出绚丽多姿的文明之花。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,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元素越多,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重要。人的文化教养水平越高,对文化的追求越多,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越深刻。

跨入21世纪的门槛,中华民族终于看到了现代化的曙光。民族复兴的伟业、全面小康的目标、科学发展的理念、和谐社会的理想,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,而且为文化的振兴开辟了广阔的空间,一个中华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的新时期到来了。此时,有必要对文化的地位、作用及其社会价值进行一番新的审视,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。

# 文化价值

## 文化与民族精神

文化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血脉,是实现民族凝聚、民族认同的灵魂,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。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,即使身在异国他乡,但凭借着黑头发、黄皮肤,凭借着中餐、中药、方块字,凭借着一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同胞。

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——古埃及、古印度、古巴比伦、古中国中,唯一幸存下来依然保持着基本文明形态的就是中国。今天的中国人,依然自称是炎黄子孙、龙的传人。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等古代经典历经数千年依然流行。为什么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,历经劫难而没有消亡,几度分裂又九九归一,屡遭外族侵占而没有灭种呢?其最深厚的原因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、生命力和创造力。文化的力量,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、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。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,即使暂时被武力征服了,被强敌占领了,但只要文化的根脉还在,她就有东山再起、绝地逢生的希望。如果文化的根脉

被切断了,那这个民族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正如古人所说的:“灭人国者必先灭其史。”

那些被称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不只是长城、故宫、兵马俑,也不只是“四书”“五经”、唐诗宋词,而是根植于亿万民众之中,深深影响着国人的精神理念、行为准则。如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;以人为本,天人合一;孝悌为本,亲亲为上;依仁蹈义,兼爱天下;义不容辞,当仁不让;忠诚待人,言必信,行必果;持道中庸,恭敬礼让;将心比心,宽恕为怀;和而不同,和谐为美;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等等。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,博大精深,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线索,就是正确处理三大关系:一是正确处理天人关系,应当秉持中庸,不偏不倚,和为贵,这样才能各方和顺,天下太平;二是正确处理天人关系,应当道法自然,敬畏天地,这样才能阴阳平衡,天人合一;三是正确处理身心关系,应当神志专一,身心协调,这样才能福寿安康。这三大关系是人类永远面对的基本问题,其中“和为贵”“天人合一”“身心协调”的思想,至今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。